

研習心得報告

褚寧 暨南大學中外關係研究所博士生

起初，我在閱覽招生簡章時，便對本次研習營的主題“關中·外緣”抱有極大興趣，由於自己的博士論文是探討明代國家權力向西番邊地的推進，也算是與這一主題契合。加之，本次研習營大佬雲集，陣容強大，如有王明珂、葛兆光、王德威、榮新江等名家出席親授，遂成為本人報名的動力。自知競爭激烈，只是抱著試一試的態度，未曾想過自己能進入候選名單。總之，格外幸運。十天的學習過程，短暫且充實。無論是學者演講、田野考察還是分組討論，都是一場接一場的學術盛宴。不同學科以及不同研究領域的學員在一起思想彙聚、碰撞，尤其難得。下面簡單談談我的兩點心得體會：

1、關於王明珂老師的講座，讓我們重新認識了文本（表征）與本相之間的關係。如果說，歷史學家一直以來希冀通過文獻資料來還原、重建所謂“真實的過去”，那麼在後現代主義“解構”的風氣下，傳統的文獻研究卻面臨著巨大挑戰，當然，我們並非急轉直下將全部文本視為純粹想像力的產物，而是應更多地關注文本表徵（無論是否虛構）背後的社會情境（本相），亦即知識（社會記憶）生產、傳遞、改變的過程，這正是王明珂老師所倡導的反思史學，如其所言：“一個事件的歷史重要性（它如何影響歷史）不只在於此事件本身的性質，也在於（或更在於）它為何被人們記得，以及在敘事中被人們與其他事件以時空及因果關係相聯結，以成為一傳遞特定訊息的社會記憶。畢竟，人們基於其社會記憶（及由此產生的身份認同）而行動，因而締造歷史，且人們為何記得、如何記憶，都與其存在其間的社會情境以及個人之身份認同有關。”（王明珂著：《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57頁。）

2、關於田野考察，給我最大的收穫乃是能夠親身踐行“進村找廟”與“進廟讀碑”。我們不必狹隘地將此類方法視為“華南研究”的“專利”，而是應該以開放的心態學習如何“從田野中發現歷史”？如何透過民間文獻從地方來看國家？例如，在須彌山石窟考察期間，我們通過找碑、讀碑，一步步向圓光寺的“本相”靠近。現存的石碑主要有三方，分別為：（1）成化四年立“救命之寶”（碑陽）、“敕賜禪林”（碑陰）；（2）成化四年立“敕賜圓光”（碑陽）、“圓光碑記”（碑陰）；（3）成化十二年立“重修圓光寺大佛樓記”（碑陰碑陽兩面鐫文）。而三方碑文皆有相互抵牾之處。按碑文一記載，正統初年，原景雲寺（宋崇寧五年賜名）倒塌，番僧住持“綽吉汪速”重修殿堂，並乞賜寺額，至正統八年，遂得名“圓光

寺”。而在碑文二中，卻完全沒有提到番僧住持“綽吉汪速”的事跡，代替他的則是一位號曰“大方”的漢僧，此人早於正統五年前便擔任景雲寺住持，後帶領僧眾修葺傾圮的佛殿，至正統十二年，正式乞請寺額“圓光”。成化四年時，大方已經78歲高齡，不過此時擔任圓光寺住持的卻不是“大方”，而是番僧“喃噶堅參□□□□。”此外，碑文三同樣提到住持“大方”於正統初年修復佛殿的事跡，但令人疑惑的是，番僧在此碑文中卻蹤跡全無。該碑為何要抹去番僧在圓光寺的歷史功績？以上情形似乎暗示，圓光寺地區存在漢僧與番僧之間的權力鬥爭，而最終則以番僧勢力的退出告終？眾所周知，土木之變以後，明蒙之間戰略態勢逐漸發生變化，固原地區遂成為蒙古南下侵擾的對象，亦使得該地區的軍事地位得以逐步提升，也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固原地方社會秩序可能出現一個重整的過程，而番僧勢力的消弭，或許和明廷擔憂蒙番勢力聯合有關？

報告的最後，要特別感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以及陝西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等相關學術機構、基金會的大力支持。感謝第四小組田野導師李仁淵及同組的小夥伴尹敏志、周明帥、馬棟予、周穎菁、張澤坤、陳柏言、蔡瑩瑩、丁樂靜，想念和你們在一起的短暫時光，相遇有時，願後會有期。